DONGFANGMINSUXUELIN

刘魁立民俗学论集

东方民俗学林
上海文艺出版社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1982年11月作者在日本参加学术讨论会，日本著名民间文艺学家关敬吾（左一）亦在座



1983年5月21日作者在中国民俗学会成立大会上报告筹备经过。钟敬文先生（右二）和杨成志先生（右三）在主席台上



1989年5月21日作者在湘西苗寨考察



1989年作者（前排右二）与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工作人员合影，前排右三钟敬文、左二贾芝、左一董良辉、右一刘锡减



1989年10月11 日，作者在四川成都参加首届《格萨尔》国际学术讨论会



1990年，作者（右三）和王平凡（左三）以及新疆少数民族学者



1991年4月作者参加“民族文化保护和发展”国际学术讨论会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1996年6月《中国民间故事集成》总编委会部分同仁，右一许钰，右二作者，右三钟敬文，左一孙剑冰，左二冯志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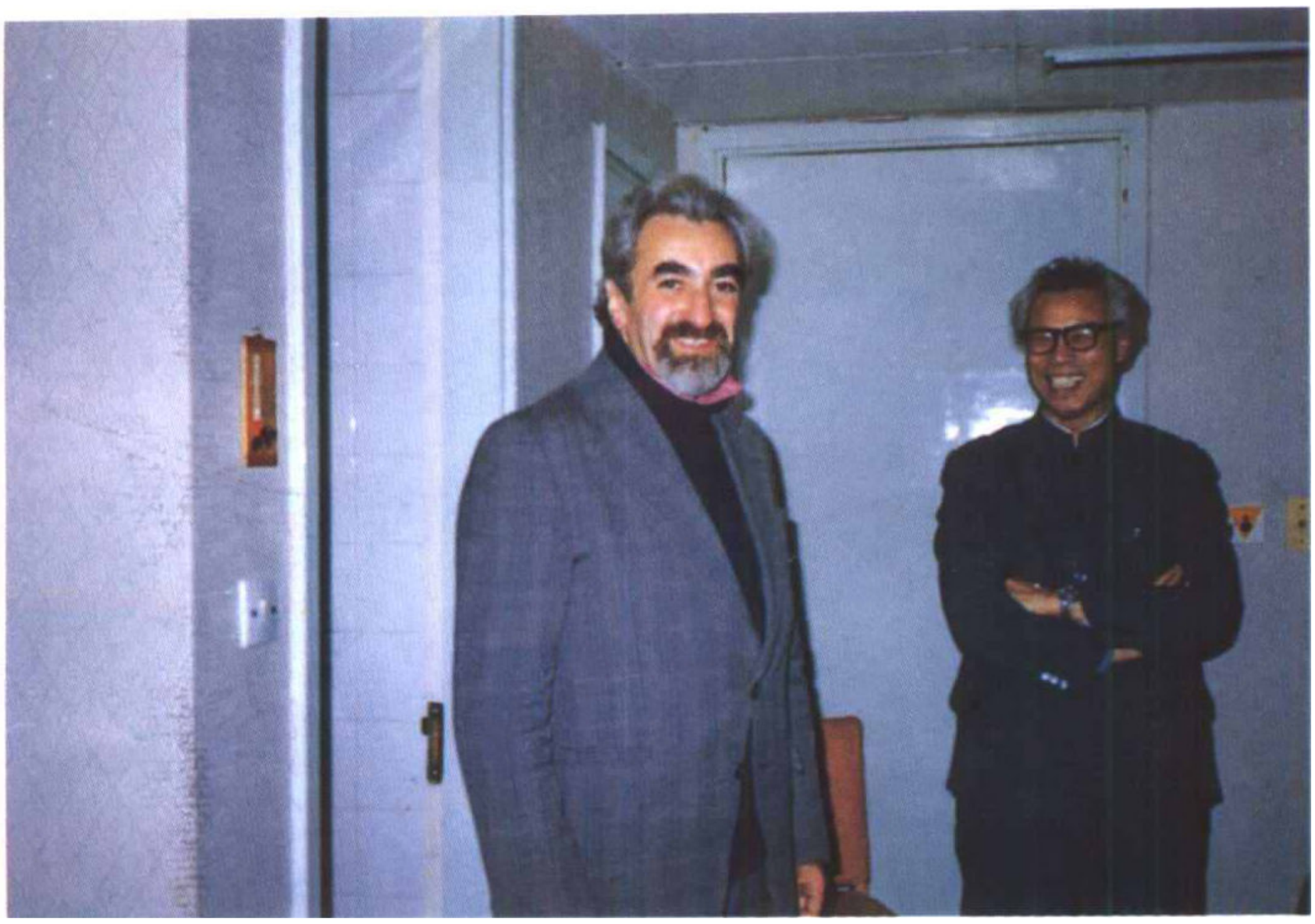
1996年6月作者在北京师范大学讲授《欧洲民俗学史》时，和部分博士生、访问学者合影。



199年9月23日作者（右一）在东亚民俗学会学术讨论会上发言



1996年11月1日作者在第三届韩、中、日民间叙事文学国际学术大会上宣读论文。



作者与俄国汉学家李福清通讯院士在一起



1996年9月作者与韩国著名民间文艺学家崔仁鹤教授



1997年未作者同世界著名文化人类学家、神话学家E·米列金斯基教授



1998年2月作者同俄罗斯科学院通讯院士、著名文化人类学家契斯托大教授夫妇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自　　序

本书所收的文章是我在民俗文化方面的部分研究成果。在这篇自序里，我想谈谈我同中国民间文化的情缘、我学习、研究的历程和感受，以及书中一些文章的写作情况和初衷。

十兄弟的故事和民歌《小白菜，地里黄》，我是从很小很小的时候就听过、唱过、十分喜爱过的。可是，我知道“民间文学”这个词儿、系统地学习和了解这方面的知识，却是二十岁以后的事情。

童年时代，铁蹄下的生活不堪回首。我一生下来看到的就是侵略者统治的天日。家里的老人不识字，整天为生计而劳苦奔波，我不记得对我有过什么直接的民族主义的、爱国主义的教育，只是他们关于关内家乡的甘甜的回忆和不能归去的苦味的遗憾，深深地震撼着我。身在其中的年节习俗和深觉有趣的婚丧礼仪，《孟姜女哭长城》、《牛郎织女》、《嫦娥奔月》、《屈原投江》等传说、故事，以及偶尔看到但又不甚了了的几出戏文，差不多囊括了我关于祖国的全部知识。

1945年之后我才有了祖国，才感受到祖国的可亲可爱。1950年我初中刚毕业，就出于赤子之心，接受祖国的召唤，投

身到一个军队所属的学校学外语，随时准备着到炮火连天的战场上去卫国保家乡，那时才刚满16岁。烽火甫熄，我毕业留校，担任外语语法教员。工作不久，就被派往苏联留学。

正是这个生活转折使我从感情深处、从理性上热爱起民间文学。

一年级的课程很重很重，时间排得满满的，有的时候从早上九时到晚上九时连续上课。在所有的课程里我最爱听的是拉慈克教授的古希腊罗马文学和契切洛夫教授的俄罗斯民间文学。由于对民间文学的迷恋，所以在二年级时我坚持完成了以民间故事为题的学年论文。我还利用假期参加了民间文学考察队。这在各国留学生中也没有先例，因此在办出差手续时还增添了不少麻烦。

带领我们下乡的是年过半百的鲍米兰采娃教授。行前的准备很充分、很细致、很周详。由于中国学生的声誉好，所以把一台新配置的录音机，交给我携带、管理和操作。这台四五公斤重的机器当时算是最袖珍、最先进的民用录音设备了。我们要考察的地方是当时苏联最著名的民间故事家科洛里科娃的家乡伏罗涅什州安娜区老托以达村。

回校后，我便着手整理我在搜集工作中的体会，并参考我从出国以来就一直订阅的《民间文学》杂志上的文章，写出了《谈民间文学搜集工作》的长文。文章寄出后，很快就刊登在1957年6月号的《民间文学》杂志上。

谁曾想，这一篇讨论民间文学搜集工作的文章，在很短的时间内竟引发出那么多的批评，乃至形成为一场关于民间文学搜集整理的大讨论。当然也有隐约地持赞同观点的，但持反对意见的居多，以致我不得不在1960年另写一篇文章重申

我的观点，并对我不同意的见解给以总的回答。大约四十年前写的这两篇文章今天看来显然不乏偏颇、幼稚主观、生硬的地方，但在我本人来说，基本观点并未改变。

1957年在一个大的政治运动背景下，在民间文学搜集问题上，民间文学界曾经批判过“一字不动论”。被当作为“一字不动论”代表而受到批判的钟敬文先生后来对我说，只有你的文章里写过搜集要一字不移，我是“代人受过”。这虽是一句玩笑话，但却饱含着无数的辛酸。我当时作为一个尚未入门的学生，认为搜集与出版是两回事，出版由于目的不同又当分作若干情况。但不管怎样，在最初记录的时候，都要准确忠实，一字不移，这应该成为一条原则。此前我虽读过一些书籍、文章，但限于当时的条件，没有系统地学过中国民间文学课程，对中国民间文艺学的历史所知不多。当时，在国外，读了批判“一字不动论”的文章，还以为真有那样的应该受到批判的“反动”主张，无论如何我也没有和自己联系起来。过了很多年，知道事情是由我的文章而起，殃及他人代我受过，心里有说不出的愧疚和不安。

留学期间，我多次参加考察队，到边远的农村，进行民间文学调查，搜集作品；还到过临近芬兰边境的卡累利亚地区，寻访过接近消亡的民间史诗的踪迹。多次的下乡考察、以及我选修的托卡列夫教授的《世界民族学》、梅列金斯基教授的《史诗原理》、《神话诗学》等课程，是那样强烈地吸引着我，以致使我在由大学本科生转为研究生时，选定了民间文学作为专攻的方向。1958年，我回国参加了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第二次代表大会，看到祖国欣欣向荣、热火朝天的情景，看到新民歌运动的蓬勃场面，更加坚定了我学习民间文学专业的决

心和信心。

起初，我忙于应付不易通过的副博士基础考试，对如何做研究工作，茫然不知。我曾就此请教过导师契切洛夫教授，他笑着对我说，我告诉你一个秘密——我也没有掌握这方面的诀窍。我们可以试着做，我指给你几本书，你读过一本，这一本就会引导你去读另外三本，那三本又会引导你继续向前走；当然，研究工作不光是读书，还有其他的实践活动，不过道理是一样的。

在苏联读书期间，我真的是嗜书如命。而且见了好书就买，所有的助学金，除了吃饭，其余的全部买书了。买新书自不必说，旧书店我也常去光顾。《原始文化》《金枝》《拉法格原始文化论集》《作为文艺批评家的恩格斯》《赫哲人》《历史诗学》等等，乃至本专业一些十月革命前出版的旧书，都是我在旧书店买到的。

在读书的过程中，我有时也会把中国的学术发展道路同俄国民间文艺学的历史进程进行比较。我发现，中俄两国的情况是很不相同的。俄国由于斯拉夫学派和西方学派两种思潮的激烈斗争，在民间文艺学界，神话学派和流传学派便特别活跃，但人类学派却没有得到充分的发展。中国则不然。由于中国文化思想发展的特点，由于中国的国情，由于英国学术思想的影响等原因，致使人类学派的学术观点在中国民间文化研究的各个领域大有市场，渗透广泛。鉴于这种情况，我对人类学派的原著、以及它在俄国的发展状况便十分留意，后来我还特意选定了《俄国民间文艺学中的人类学派》作为我专题论文的题目。

令人痛心的是，时隔不久，契切洛夫教授因心脏病突然发

作，而英年早逝。后来便改由民间故事研究家鲍米兰采娃教授担任我的导师。她征求我的意见■论文是选俄国题目，还是选中国题目？我想，既然要■就不要怕困难，要学导师最独到、最有成就的部分。于是■定俄国农奴制改革时期的民间故事作为研究对象。最后进行学位论文答辩，题目便是这时期的民间故事中的现实与幻想问题。

完成答辩，获得学位，返回祖国，我又回到母校黑龙江大学担任教学工作。

我讲授过一年中国民间文学课，后来受全国形势的影响，这门课停授，我被分配讲授“当前文艺评论”课程。这期间使我受益终生、永远不能忘记的是，在黑龙江省文联的支持下，我多次到省内各地进行民间文学调查和搜集工作。当时我们的计划是很有规模的，我曾经设想，在若干年内，要按地区、按民族、按职业，把全省民间文学蕴藏和流传的情况都考察一遍。我们曾经对满族、朝鲜族、回族、赫哲族进行过民间文学调查，还专程搜集过抗联的传说。当时的条件很差，能够用的只有笔和纸。记得我们曾经借到一台美国二三十年代制造的录音机，是用钢丝录音的，机器有十几公斤重。扛到乡下，电压不稳，录音机快快慢慢、转转停停，几乎没法工作。于是又在专区借了一个稳压器，这个大铁疙瘩比录音机还要重。我同一位年岁比我大的先生，拿了一根四五寸直径的长木杆子，抬着这两个“宝贝”，身上还背着行囊，就这样一村一村地采访着、调查着。在我所在的黑龙江省的范围里，居住着那么多的少数民族同胞，他们的传统文化又是那样的丰富多彩，这使我非常惊异、非常兴奋，好像在我面前打开了一座收藏着无数奇珍异宝的宝库。这些调查使我实际地观察和了解到中国民间

文学现实存在的状况和环境，使我更了解了创造和保存这些文化遗产的人民群众。

后来，风云突变，这些事都做不成了，而且都被否定了。仿佛地球将换一种样子转，并且将永远那样转下去。这段历史想忘记也难以忘记。

进入70年代，一种想做些有益事情的强烈情绪，在时时躁动，最后驱使着我仍旧回到原来钟爱的领域，开始偷偷地翻译起拉法格的原始文化论著。我心想，夜里翻译，连共用一个厨房、一个厕所的邻居也不让他知道，万一事情暴露，因为译的是马克思的女婿宣传恩格斯观点的著作，或许不会定太大的罪。我在我的译稿本上写过一段感想，其中一句是：“愁苦灯下译旧书，相寄难言隐。”后来，形势略微松缓一点的时候，我还翻译了《列宁年谱》、车尔尼雪夫斯基描写农奴制改革前夕俄国思想斗争的小说《序幕》等著作，总共有二百多万字。

1979年春，我从黑龙江调到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工作。一到北京，我就有幸参与了恢复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准备文代会等重大活动的部分工作。看到贾芝、王平凡、毛星等几位前辈为恢复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而反复等划、四处奔走，我深为感动。通过起草文件件、等备会议的具体工作 ，通过亲自参加“ 中国民间诗人歌手座谈会 ”和第西次文代会以及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代表大会，我接触到全国知名的故事家、歌手、搜集家、理论工作者。他们在十年浩劫中所遭受的苦难、和心灵所受的创伤，是那样的深重。一旦获得解放，他们心中的一团火复又燃起，而且烧得更旺；文化创造的激情，如奔腾的马群、如澎湃的春潮，不可遏止。看到这些，我感到有很多事要我去做，而且感到能够做这些事是愉快的、幸福的。

1980年协助毛星编撰《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一书，使我有机会较为切近而且较为深入地观察和了解生活在新疆、云南、贵州、四川、湖南等省区的许许多多少数民族以及他们的文化历史，特别是他们的文学、艺术。我全身心地投入在这项工作中。跑了那么多地方，结识了那么多的少数民族朋友，学到了那么多新鲜有益的知识，那段时光是永远值得珍贵的、永远不能忘怀的。通过实地调查、访谈、以及同各民族学者一起研究问题、讨论提纲和修改书稿 ，在我面前展现出一个全新的天地，这比起当年听托卡列夫教授讲课时像看电影、看画图似的纸上谈兵，不知要亲切多少倍、具体生动多少倍。

在新疆，为了撰写俄罗斯族民间文学概况，我们特地把仅能请到的俄罗斯同胞邀集在一起，他们在劫难过后像久别重逢的亲人，那么冲动、兴奋，他们唱起久已不唱的民歌，跳着热烈火爆的民间舞蹈，一个个心情激荡、如醉如痴。

在西双版纳，我们出其不意地赶去参加一位傣族同胞新房落成的庆贺仪典，新建好的竹楼尚未打隔断，像是一个大礼堂。屋内摆放着十几张小方桌，周围坐了几十个人，桌上摆着酒、肉和其他傣族食品。许多品级不等、技艺有别的民间演唱家——“赞哈”，分散地坐在各自的听众中间，拿着纸扇遮住脸，为大家演唱。据说从前的听众是用投币的方式表示喝彩，所以民间艺人的纸扇以破为佳。今天，各位“赞哈”演唱虽也有比试高低的意味，但未见有听众投币的场面了。过了一段时间又开始立灶石的仪式，所有宾主活跃而激动，虔敬而严肃……夜半之后，回到住宿的竹楼，我听着远处仍然狂放不歇的歌声，辗转反侧，思绪万千。虽然我赶了一天的路，困乏到了极点，但无论如何也睡不着。一阵无声的润雨像轻风一样飘

过，空气是清新的，我的心绪也是清新的。我由衷地感到，他们是我的同胞，我是他们中的一员，把世世代代创造流传的文化遗产搜集起来，加以整理、研究，使其优秀的传统得以继承和发扬，是我们共同的历史责任。

《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付排以后，我便有时间放开思路考虑问题。我感觉到，长时间对国外的学术发展闭目塞听的封闭状态，使我们缺少了参考和比较，限制了中国学者才智的发挥；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思想方法，使我们进步缓慢，研究难以深入，甚至使我们的许多优长也渐渐失去光泽，有的甚至变成不断重复的陈词老调。大家都痛感有尽快改变这种落后状况的必要。为此，首先要运用科学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和方法，深入实际，全面掌握和分析民间文化的现实状况和真实材料；同时还要总结和借鉴人类智慧之光已经照亮的科学发展道路，包括中国学者和外国学者已经走过的探索历程。有鉴于此，我开始研究欧洲民间文化研究史问题，并着手撰写这方面的系列论文。评论神话学派、流传学派等文章就是这样写成的。

为了认识和分析当代外国的五光十色的新理论、新观点，我认为有必要以简捷的办法和较快的速度追视其历史，明了其根源，这样才不致于在这些时新论调的绚丽的外衣和炫目的光彩面前感到困惑莫解。于是，1985年开始，我策划主编了一套《原始文化名著译丛》，希望能把欧洲民间文化研究最基本的理论著作介绍给国人，尽快填补这一空白，免去学人再在二三流著作上花费更多的精力和时间。我希望我国学界能在较短时间内迎头赶上，充分利用我国的优越条件，做出我们出色的贡献，在广泛的国际学术对话中发出更高更强的声音。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